

·中国学术百年·

哲学 百年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组织编写
北京市哲学学会

谢龙 胡军 杨河 著

 北京出版社

·中国学术百年·

哲 学

百年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组织编写
北京市哲学学会

谢龙 胡军 杨河 著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哲学百年/谢龙等著. —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9

(中国学术百年丛书)

ISBN 7-200-04032-1

I. 哲… II. 谢… III. 哲学史-中国-现代 IV. B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0995 号

·中国学术百年·

哲学百年

ZHIXUE BAINIAN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北京市哲学学会

组织编写

谢龙 胡军 杨河 著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朝阳展望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625印张 228 000字

1999年12月第1版 1999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200-04023-1

B.80 定价:16.00元

致读者

历史巨人的步伐即将迈向 21 世纪。过去的一百年里，中国人民历经沧桑，在奋起斗争中实现了伟大的历史变革。曾被称为“沉睡的雄狮”的中国已经觉醒，并以其惊世的雄姿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间，中国的学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辛勤耕耘，为祖国的昌盛和科学的繁荣竭智尽忠。《中国学术百年》这套书，正是试图对这一历史进程留下记录。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组织十余个学会的近百位专家学者，经过一年半的努力，终于可以在本世纪末将这套书奉献给读者了。一年多来，我们召开了几十次会议反复探讨，作者们不辞劳苦专心撰文，都是希望展现百年来各学科的发展脉络，反思其曲折经历，总结其宝贵经验，为学界同仁提供有益启示。果能如此，我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谨以此套书献给即将到来的新世纪！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1999 年 10 月

前 言

立足世纪末，回顾整个 20 世纪的哲学学术历程，深感中国哲学虽历经坎坷，但哲学变革、哲学现代化的时代潮流是不可阻挡的。围绕百年来从学术上多方探索哲学变革、哲学现代化与中国哲学走向世界的途径，评析 20 世纪中国哲学学术的经验教训，成为世纪末哲学研讨的一个热点。本书即以此为主题。

20 世纪一二十年代随西方哲学传入，由中西哲学冲撞与交融所启动的中国哲学变革，孕育着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型。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型一开始呈现多元趋向，如对学术上以传统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西融通、重建中国哲学的尝试成果显著，但对 20 世纪中国哲学走向具有决定意义的是通过对传统儒家思想进行否定性批判，在政治上作出马克思主义的抉择，开拓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导的中国哲学的新传统。

20 世纪末，随改革开放与持续不断的文化热，出现了空前的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多元并存、互动的学术格局。这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发挥政治先导作用，实现中国传统哲学现代转型的绝好时机。为此，建议进一步改革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各自“分割”的学科划分，特别是要进一步打破“封闭”研究的陈旧学术框架，以扫除阻力，积极推动现代中国哲学于 21 世纪大踏步走上世

界，承担起 21 世纪赋予的振兴中华文化的历史使命。

本书评析我国 20 世纪百年哲学学术的经验教训的主题，肯定会成为下个世纪哲学研究的一个重点课题。因百年哲学学术涉及问题浩繁，只能选择重点予以评析，我们以此书管见参加研讨，难免有不妥与疏漏之处，望不吝赐教！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西方哲学的东渐	(1)
一、实用主义在中国	(3)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	(14)
三、分析哲学在中国	(28)
四、康德、黑格尔哲学在中国	(41)
第二章 中西文化、哲学的冲突与融合	(46)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传统文化	(46)
二、全盘西化还是本位文化	(60)
三、儒学的复兴	(74)
第三章 中国哲学的重建	(86)
一、形而上的追求	(88)
二、知识论的开拓	(111)
三、方法论的自觉	(128)
第四章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与 曲折发展	(143)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对旧哲学的超越	(143)
二、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中的“曲折”	(155)
三、哲学与政治关系的反思	(170)
第五章 中国哲学的新开端	(181)
一、真理标准讨论与邓小平哲学思想	(181)

二、文化热中的“人道主义”哲学思潮·····	(192)
三、传统哲学热与现代新儒学·····	(206)
第六章 中国哲学的新格局·····	(216)
一、以主体性为突破口的认识论探究·····	(217)
二、多元哲学互动的本体论探究·····	(229)
三、综合创新的哲学思维方式探究·····	(241)
第七章 比较哲学与 21 世纪中国哲学展望·····	(258)
一、多元比较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	(259)
二、多元比较推动新人文观念确立·····	(270)
三、多元比较推动中华民族文化振兴·····	(288)
后 记·····	(299)

第一章

西方哲学的东渐

延续了几千年之久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由于西方文化的东渐而逐渐地显示出它固有的种种弊病。当西方世界在 17、18 世纪逐渐完成了工业革命、建立了民主的政治体制、不断开拓世界市场使资本国际化的时候，中国仍处在政治上封建专制、经济上自给自足、文化上闭关锁国的年代。显然，中国的这种落后状态已完全不适应于世界历史的近代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潮流。从表面上看，似乎是西方的物质文化冲开了中国的大门，其实，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种种弊病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的进程。长期的积弱使我们在西方文化面前不堪一击，处处被动挨打。中国正是在西方的船坚炮利的物质文化的撞击下被迫打开了国门。所以，在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是在一种被动的状态下进行的。但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只有在这样的文化交流和融合的过程中，才能给文化的复兴和发展带来可能性和机遇。明清之际，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哲学已呈衰落的景象，因此中国的文化要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就必须吸收异质文化的思想资源。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直缺乏现代实证的科学精神和方法，也缺乏可与现代政治民主相对接的传统。中西文化的交流有助于我们吸收西方文化中可与现代人文精神相对接的思想观念。

哲学是文化的核心部分，哲学的交流也同样是文化交流的

核心部分。近代以来，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实质性的接触始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但是，一直到了戊戌变法之后，西方文化中的哲学才开始为中国的有识之士自觉地注意到。可以说，西方哲学传播到中国实在是太晚了。虽说在新文化运动之前，西方哲学中的某些哲学流派已被介绍到中国，然而这种介绍是很浅显、粗疏的，没有计划，没有系统，缺乏学术水准。而且，介绍者本人对于被介绍的对象所知极少，根本谈不上什么真正的研究。所以，西方哲学对于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和中国社会没有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影响。但是，在新文化运动之后，情况就很不一样。首先是更多的西方哲学流派被介绍进中国，其次是有些哲学流派在中国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形成了极大的社会思潮，影响了以后中国社会的进程。如果从这个角度着眼，那么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就是我们必须要特别注意的两个哲学流派。另外，从纯哲学，即哲学学术的角度看，在三四十年代建立起来的金岳霖和冯友兰的哲学思想体系是受了英美新实在论的很大影响。当然，其他的西方哲学流派无疑地也在中国社会和中国学术界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影响，但是它们的影响却不能与实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在中国所产生的影响相比；如果从中国哲学重建的角度讲，它们也是不能和新实在论或分析哲学相比的。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我们确定以实用主义或实验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为探讨的重点。

在引进和介绍西方哲学方面，贺麟的工作应该说是做得最有计划，也最为系统的。他是自觉地以介绍和引进西方哲学为己任的，几十年一贯地在中国推进黑格尔哲学的介绍和研究，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绩。德国古典哲学在中国现代哲学界产生过广泛而持久的影响，这和贺麟所做的工作是分不开的。他在介绍和引进德国古典哲学方面的经验和方法值得我们借鉴。

一、实用主义在中国

实用主义哲学思想主要是通过或借助于胡适而在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在五四运动前后十年支配了整个学术界。贺麟曾经这样说过，实用主义思想“在五四运动前后十年支配整个中国思想界。尤其是当时的青年思想，直接或间接都受此思想的影响，而所谓新文化运动，更是这个思想的高潮。”^① 1917年，新文化运动启动两年后，胡适应蔡元培和陈独秀的邀请，回国任北京大学文科哲学门教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中心课题就是评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观念，看它们适合还是不适合于新时代的需要。这就是对传统的封建观念作一番重新估价的工作。评论和估价必须有一个方法、一个工具。那么所需要的工具、方法究竟是什么呢？当时的先进的知识分子如陈独秀、李大钊、梁启超、钱玄同、周树人、周作人、刘半农等人在思想上虽然属于先进的行列，但是在方法或工具上却拿不出什么新的东西。而胡适却不同，他在美国亲炙于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对于实用主义哲学的精神当然是心领神会深知其意的。在他看来，实用主义哲学主要的就是一种方法或一种工具。就在历史最需要的时候，胡适适逢其时，带回了实用主义的方法，这犹如英雄有了用武之地。

关于这一点，胡适是很自觉的。他说：“据我个人观察，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评判的态度，简单说来，只是凡事重新分别一个好不好。仔细说来，评判的态度含有几件特别的要求：(1)对于习俗相传下来的制度风俗，要问：‘这种制度现在还有存在的价

^① 贺麟：《五十年来中国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63页。

值吗?’(2)对于古代遗传下来的圣贤教训,要问:‘这句话在今日还是不错吗?’(3)对于社会上糊涂公认的行为与信仰,都要问:‘大家公认的,就不会错了吗?人家这样做,我也应该这样做吗?难道没有别样的做法比这更好,更有理,更有益吗?’尼采说现今时代是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八个字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①胡适在这里所说的这种评判的态度的核心就是实用主义哲学所谓的如果一种思想是有用的,那么它就是真的或者说是正确的。他提倡的白话文运动,他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以及他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和对禅宗思想的研究等等,都是以实用主义思想为指导的。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他的实用主义思想也就当然地通过他的倡导而影响新文化运动的性质。而且由于他的影响,另一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陈独秀的早期思想也是倾向于实用主义的。

胡适和杜威在思想上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他们都对宗教持一种十分理性的态度,不相信任何的宗教。胡适在十几岁时就有了好怀疑的倾向,所以早在那时,他就在寻找一个能解决他的怀疑的方法,而杜威认为一切有系统的思想就法则来讲都是在一种怀疑的状态下产生的;胡适对历史考据有癖,深受汉学的影响,而杜威的思想方法在胡适看来与清儒的考据训诂的方法有相似之处;胡适不喜欢玄虚的学问,总喜欢把学问做实,这与杜威也有相通之处。在接触到了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之后,胡适认为,实用主义的思想能够解答他自己思想上的疑惑。于是,在美国留学期间,他完全地醉心于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

杜威于1919年2—3月间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讲学。于

^① 胡适:《胡适文集》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52页。

是，胡适和蒋梦麟等一批杜威的学生乃商请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江苏教育会等筹集资金邀请杜威来华讲学。在杜威来华之前，胡适于1919年4月15日《新青年》6卷4号上发表了《实验主义》一文，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实验主义^①哲学。1915年5月1日杜威来华，前后在华讲学两年，使实验主义哲学在中国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传播。在杜威之前，西方哲学家如赫胥黎、达尔文、斯宾塞、叔本华、尼采等都有人作介绍，但都是间接的，而杜威则是直接来华传授实验主义，使中国学者第一次面对面地与西方哲学家接触。而且由于杜威在华时间长，讲学的地方多至十一个省，再加之杜威的学生胡适、蒋梦麟、陶行之等这些有很大社会影响的学者的不遗余力的宣传、提倡和身体力行的实践，遂使实验主义哲学思想在新文化运动的前期和中期占有了主导地位，成为了一种很有影响的社会思潮。

杜威在华的讲演共有一百次以上。这些讲演的内容纷纷地为当时的各种报纸及时地刊登了出来，在当时的社会上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不少知识分子为了配合杜威的在华讲学活动，通过各种不同途径和采取种种不同形式，认真地学习和研究了实验主义哲学思想，并且极力使实验主义思想在中国广为传播。如《新教育》曾以“杜威专号”来比较全面地介绍杜威的哲学思想；当时，詹姆士的《实用主义》，杜威的《哲学的改造》和《思维术》已被译成中文，如此等等。所有这些活动使实验主义哲学在中国当时的思想界占有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地位，使它的影响显然要远远大于其他已被介绍到中国思想界的西方哲学流派。杜威的这些讲演可归纳为五大主题，即《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教育哲学》《思想之流派》《现代的三个哲

^① 实验主义是实用主义的一种，在本书中指杜威的哲学观点。

学家》《伦理讲演记略》。杜威的五大讲演后来由北京大学新知书店出版，书名为《杜威五大讲演》。通过这些讲演，杜威把实验主义哲学的主要观念介绍给了中国人民。

在中国思想界宣传和提倡实验主义思想的当然不仅仅是胡适，其他还有蒋梦麟、陶行知等人，但是似乎只有胡适才是实验主义哲学思想在中国思想界的主要代表。他除撰写了《实验主义》一文之外，还写下了《杜威先生与中国》《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等文章来孜孜不倦地宣传和介绍实验主义思想。当然，他关于实验主义的文章并不仅仅是上述这些，可以说在他的几乎所有的著述中都浸透了实验主义哲学的精神。

第一，胡适阐释实验主义哲学的根本态度与思想方法

他指出，实验主义的根态度是反对把科学律例看作是一成不变的天经地义的东西，而是认为科学上的许多发明都是运用假设的结果。科学的律例不过是一些最实用的假设，不过是现在公认为解释自然现象最方便的假设。这些科学律例用来解释事物现象能够令人满意的的就是真的；解释得不令人满意，便不是真的，就该寻求别的假设来代替了。这就是说，实验主义哲学认为科学律例是人造的，是假定的，全靠它解释事实能不能令人满意，方可断定它是不是实用的，科学律例并不是永远不变的天理。胡适认为，这是实验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根本学理，实验主义根本不承认我们所谓的真理是永远不变的，只承认一切真理就是应用的假设。假设的真不真，全靠它能不能发生它所应该发生的效果。实验主义者所谓的律例实质上就是理论。这样的理论能够满意地解释自然事物就是在一时一地的所谓的真理。可见，在实验主义者，至少在胡适看来，任何理论都是只有相对性，而不承认任何绝对的理论或真理。这就是所谓的科学实验室的态度。实验主义的另一个根本的态度就是所谓的历史的态度。它指出，进化论认为，物的种类也不是一成

不变的，都有一个由来，都经过了许多变化，方才到今日的种类。不但种类如此，真理也变化。种类的变化是适应环境的结果。真理不过是对付环境的一种工具。环境变了，真理也应随时改变。所以没有永久不变的真理，没有绝对真理。只有具体环境中的这个真理或那个真理。这一类的“这个真理”是实在的，是具体的，是可以证实的，是有凭据的，是特别的。实验主义把进化论的观念运用到哲学上便有了一种“历史的态度”，这就是要研究事物如何发生，怎样来的，怎样变到现在的样子的。这种“历史的态度”的方法就是要把注意点从最先的事物移到最后的事物，从通则移到事实，从范畴移到效果。总之，科学实验室的态度和历史的態度便是实验主义两个最根本的观念。胡适认为，这两个态度都是 19 世纪科学影响的结果。所以，实验主义就是科学方法在哲学领域中的运用。

实验主义反对虚玄的思辨哲学，主张哲学要能解释生活，应付环境，适应环境，能解决生活中的种种问题，所以实验主义注重方法。胡适的治学方法和思想方法，可以说，完全地得之于杜威。他认为，他本人治中国思想与中国历史的各种著作，都是围绕着“方法”这一观念打转，认为“方法”实在主宰了他四十多年来所有的著述。他承认，在方法上他是得益于杜威。杜威认为，有系统的思想通常要通过五个阶段：一是困惑和疑虑的阶段；二是决定这困惑和疑虑究竟在什么地方；三是假定种种解决困惑和疑虑的方法；四是选择许多假设之中的一种作为解决困惑和疑虑的可能的解决方法；五是小心求证阶段；对所选择的假设加以证实，以求对他的疑虑和困惑求得满意的解决。胡适有时又把杜威的五步说进一步概括为三步说：一是发现种种问题，找出疑难之处；二是提出解决疑难的假设；三是通过实验加以解决。但是，胡适更经常的作法是把上述的两种说法归结为“十字真言”，即“大胆的假设，小心

的求证”。胡适的所谓“十字真言”的方法论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留下了深刻影响，它大体上有怀疑、假设、求证三个环节。

其一，怀疑。疑难、困惑的产生就是由怀疑而产生的。胡适十几岁时就有较为强烈的怀疑精神，并一直在寻求解决怀疑的办法。受到了杜威和赫胥黎的影响，他更强调了这一点。他后来回忆道，有两个人对他的影响特别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便是杜威。赫胥黎教他怎样怀疑，教他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则教他如何去思想，教他要时时处处考虑到当前的种种问题，教他把一切的学说理想都看作是待证的假设，教他处处考虑到思想的结果。应该说，这种怀疑的精神是从事思想研究、学术研究的基本条件。没有怀疑精神，也就没有真正的思想的研究，也就没有真正的学术研究。有了这种怀疑的精神就能解放思想，就能促进思想的发展。推动哲学思想进步和发展的动力从哲学自身来说就是怀疑的精神。

其二，假设。要解决困惑和疑难就要提出种种的理论的假设。胡适认为，假设是从以往的经验里产生的。根据杜威的五步说，假设不只是一个，而是有多个，这样我们才能从中选出一个最令人满意的解决疑难的假设。胡适强调，假设一定要大胆，假设不大胆，就不能有新的发明。当然这里所谓的假设的大胆是针对于所产生的疑难而说的。只有大胆的假设的前提，才有可能寻觅到解决疑难的方法。当然，胡适的大胆的假设的思想实质上是受到了“小心的求证”的制约的，而不是毫无根据的怀疑一切。

其三，求证。胡适反复强调，求证要拿出充分的证据来检验假设是否可靠，求证一定要小心、细心。对于证据要问：这种证据是在什么地方寻找的？什么时候寻出的？什么人寻出的？依地方和时候看起来，这个人有做证人的资格吗？这个人

虽然有做证人的资格，而他说这句话有作伪证的可能吗？总之，证据一定要可信。

第二，胡适运用实验主义方法整理国故成就卓著

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方法论是严肃的客观的科学方法，这也就是实验主义哲学所要求的所谓的科学实验室的态度，强调科学研究不能有主观成见，而必须尊重事实，跟着证据走。更为重要的是胡适运用了这样的方法来整理国故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如他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红楼梦的研究、禅宗的研究、古代历史的研究都取得了开拓创新的业绩。如他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就是在上述的方法论指导之下进行的。他这种方法在研究中国先秦哲学史时就显得格外重要。在他以前，讲中国哲学史往往要从三皇五帝讲起。但是，胡适却不同，他运用怀疑的精神，采用小心求证的方法，截断众流，把材料不足、证据不充分的東西统统砍掉了，把三皇五帝一股脑儿地抛在了脑后。他的哲学史直接从老子、孔子讲起。这就是蔡元培所说的“扼要的手段”。这对于当时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无疑有着扫清障碍、开辟道路的作用。冯友兰说，当时我们正陷于毫无边际的经典注述的大海之中，爬了半年才能见到周公，见了这个手段，觉得耳目一新，精神为之一爽。胡适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当然还有其他种种特点，但是方法论却是其最根本的一点。正是由于胡适的方法论的新颖，使得《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一出版，就轰动一时，整个学术界为之振奋，不过两个月就再版了。这在客观上给当时的白话文运动增强了声势。当时的一般复古的人们认为，提倡白话文的人，大概都是不会写文言文的，甚至是不能读古书的人，不料像胡适这样的提倡白话文的人，还竟能读古文，而且能读最难读的古书，亦能做史料的鉴别、文字的考证。总之，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现代化尝试的成果，具有划时